

第一章 效忠蒋氏 平步青云

汤恩伯对属下说：“我只知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他的人一概不理。”这一原则让他在四年中从军校毕业生升至副师长。

方耀口述

我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期间，与汤恩伯的二弟媳柳柱仙、四弟媳柳柱梅之兄柳报青（浙江省永康县人）是同学。后来我在汤恩伯麾下任职期间，柳报青又介绍其侄儿柳时茂到我所在的部队，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在与柳家叔侄的交往中，我了解到不少有关汤恩伯个人及家庭的情况。至于汤恩伯部驻各地期间给民众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我更是亲历、亲见。

一、抛妻别子攀高枝

汤恩伯，浙江省武义县汤村人，1899年生。其父汤家威系地方绅士，性格豪爽，交游甚广，在地方上颇有名气。其母为张氏。汤恩伯兄弟五人，他居长，与老二永祺、老三永通均为张氏所生；老四永富、老五永毅与他同父异母。汤恩伯对双亲十分孝敬，身居要职后常接他们与自己同住，以尽孝道。

汤恩伯的发妻名叫马阿谦。马阿谦之父马振南，秀才出身，通晓阴阳八卦、看相算命之术，原是汤家戚的老师。汤恩伯出生不久，马振南看了他的八字，算定此子日后必做大官，遂请人向汤家说媒，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马阿谦许配给汤恩伯为妻。汤家戚见是老师主动提亲，自然应允，从此二人成了亲家。马振南给汤恩伯改名为其法，但不知何故，汤上学后仍用恩伯之名。马阿谦生了一子名叫汤建元，现在美国经商。



汤恩伯祖宅，在浙江武义县汤村。

汤恩伯于上世纪 20 年代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留日女学生竞白相爱。汤回国后在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麾下任少校参谋，竞白回国后任杭州女子蚕桑学校校长，二人在杭州结了婚^①。汤恩伯和竞白生有一子两女，现在竞白与其子女均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

抗战胜利后，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的汤恩伯去上海、南京主持接收工作。在此期间，汤与一汉奸头目之女在常州结了婚。

据吴绍周所撰《关于汤恩伯》一文说：汤在日本“结识一女王竞白，知王为陈仪的外甥女，慕势贪财，谋为夫妇”。汤回国后，曾任程潜第六军张轸师的少校团副、第一师贺耀祖部学兵连少校连长、第六军教导总队总队副，“时陈仪任军政部次长，调升他为军政部某科科长。”



1925 年，汤恩伯（左一）在日本士官学校与留日同学合影。

汤恩伯去台湾后，又娶了一位女子为妾。后来汤患了胃溃疡，竟白闻知非常着急，电邀汤去美国治疗，但台湾之妾非要汤去日本医治。汤在日本治愈疾病，正准备回台湾时，一天晚上突然想吃酱菜，家里人连忙买来。汤吃后即感身体不适，当夜死去。

汤恩伯身高 1.65 米，体型矮胖，方圆脸，爱好体育运动，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肯休息的人。1932 年我在江西泰和任第十四师骑兵连少校连长时，该师军需处少校科长陈鼎彝曾对我说：“我是汤家戚的挚友，也与陈仪是朋友。我在杭州经商时，介绍汤恩伯认识了陈仪。后来陈仪保送汤恩伯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这段学历对汤的前途关系极大。”

1927 年 4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陈仪为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安插自己的耳目，向总司令蒋介石推荐了汤恩伯，结果汤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中校参谋。1928 年 3 月 6

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正式开学，4月下旬开始授课。汤恩伯升任军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

二、“汤恩伯是一个肯苦干的”人”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南京城内原马标、炮标及小营旧址，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教育长何应钦（1929年5月张治中接任）第六期先后有四个步兵大队及炮兵、工兵、交通大队各一个，其中步兵第三大队于1928年7月底毕业。在各大队队长中，汤恩伯以其独特作风和表现引起了



1927年，汤恩伯在国民革命军任职时摄于江西九江。

蒋介石的重视：一是经常向蒋介石呈送有关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建议的手册，其中有些被蒋采纳；二是每天早晨跑步时，其他大队都是在校园里跑，惟独汤恩伯的步兵第一大队沿黄埔路、中山东路跑到中山门，再沿原路跑回，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汤恩伯是一个肯苦干的人”的印象。

1929年5月中旬，第六期学生毕业。军校当局为给军官补习班及第八期准备干部，于6月设立军官教育连，张治中兼任连长，汤恩伯任副连长（9月实任连长）10月，蒋介石由三元巷迁至军校内一所新建的两层小楼居住，更能经常目睹汤恩伯的

“突出表现”。1930年初，军校设立军官教育团，张治中、祝绍周分别兼任团长、团副，汤恩伯兼任步兵营营长。该团是蒋介石为培养高级军事骨干而设，聘请德国顾问指导，着重军事方面特别是新式武器的教练。1930年春，被称为“国军之模范”的教导第二师编成，张治中任师长，汤恩伯任第一旅旅长。教导第二师完全采用德国军队的方法进行训练，装备极为精良，与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同为蒋介石当时最精锐的嫡系部队。汤恩伯在两年多内一再升迁，足见他已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1930年夏，教导第二师开赴豫东，参加蒋、阎、冯中原大战，归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指挥。该师在太康以北地区中了冯军的埋伏，伤亡惨重。战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徐庭瑤任师长，汤恩伯升任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三、步步高升

朱火金口述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与各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妥协，又趁势平息了两广事件。这时，他集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了消除心头之患，便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

1930年，蒋介石调集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奔向江西，开始对井冈山中央根据地和与其紧邻的赣东北根据地进行“围剿”。同年秋，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率陆军第二师第一旅和浙江教导团，从衢县、江山沿浙赣线进入赣东北苏区的玉山、广丰、上饶等地，开始对赣东北苏区的中心地区横峰、弋阳、德兴边境的磨盘山、葛原一带，进行长达半年多的军事“围剿”。汤恩伯积极推行国民党对于根据地的一系列反共反人民政策，军事

进攻、经济封锁、政治欺骗宣传同时并举，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和无辜百姓进行残酷镇压，给赣东北苏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

赣东北（又称闽浙皖赣）根据地，位于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四省边区 52 个县，其面积约十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江西的横峰、弋阳、上饶、德兴、贵溪等 21 个县；福建的崇安、光泽、浦城等 12 个县；浙江的开化、江山、遂昌等 10 县；安徽的祁门、东流、秋浦等 9 县。这一广大地区有磨盘山、大茅山、怀玉山、武夷山、天目山、黄山等高山峻岭，地势险要。还有纵横交错的河湖汉港，千里沃野，是一个物产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发达的富庶地区，也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较为中心的地区，从这里可直逼杭州、上海、南京等重镇，并可与井冈山中央根据地互相策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27 年 12 月，当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弋横武装起义时，蒋介石就感到十分惊恐。到了 1930 年，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农民革命团、赤卫队、儿童团等革命武装组织遍及赣东北各县。在强大的革命风暴面前，赣东北根据地各县的财主富豪、党政头目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认为单凭他们自己手中的靖卫团、保警队之类的地方武装，很难与红军对阵，于是告急文书宛如雪片一般飞进国民党的神经中枢——南京政府。

对于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日益发展壮大，蒋介石早就如芒刺背，必欲除之而后快。载于民国十九年（1930）的江西省清乡报告中，蒋介石自己不得不承认说：“对于磨盘山苏区，历次军队进剿不但不能肃清，往往为其折损武器，增其势力，于是势益猖獗。”于是，蒋介石在“围剿”井冈山中央根据地的同时，仍调集重兵，指挥汤恩伯、胡祖玉、阮肇昌、赵观涛等部三万多

人，分六路出动，大举进攻赣东北苏区，妄图一口吞掉这块根据地。但赣东北军民在方志敏、邵式平等正确领导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破了敌人的包围，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蒋介石调集重兵，指挥军队，大举进犯苏区，对苏区人民烧杀抢掠，残酷镇压，罪行累累。汤恩伯及其部属在“围剿”时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点。汤恩伯率领整个建制旅和浙江教导团进入赣东北根据地后，分别驻扎在玉山、广丰、上饶县境内，兵力超过万人，防线达六、七十公里。汤部从东南方向对赣东北苏区的中心地区横峰、弋阳进行包围，与胡祖玉、赵观涛部相互策应。由于汤恩伯部建制完整，装备齐全，训练有素，驻地离赣东北根据地中心区域最近，因此对根据地军民威胁最大，破坏最烈。

在政治上，他指令驻地各县党部和政府，大肆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诬蔑共产党是一伙“共产共妻”的人，红军是一群杀人越货的“土匪”，是一伙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在驻地内实行“清乡”、“移民并村”、“五户联保（即一户通红军，五户同罪）”。并要驻地政府积极配合军队“围剿”根据地，在各县成立县、乡两级地方武装的靖卫团、保警队、联防指挥部之类的武装机构。

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严格执行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封锁匪区纲要》、《赣东北食盐买卖运输查禁法》等一系列禁令。在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隘口设立哨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检查。封锁信江上的大小船只，对于明令禁止进入苏区的食盐、西药、布匹、文化印刷用品等物资，一经发现，立即没收。在城镇还设立食盐公卖处，限制白区人民购买食盐的数量，以防食盐转卖流入苏区。

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和威胁。伤病员

缺少药品得不到及时治疗，严重地影响身体康复。广大群众因缺乏食盐，影响身体健康，影响生产劳动。布匹难以进入苏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红军战士还穿不上棉衣而受冻。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建立赤贸路线，赣东北省委、省苏维埃派出了一批精干的采办人员到白区采购根据地军民所需物品，有的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

在军事“围剿”中，汤恩伯率其旅从玉山、上饶、铅山一线进攻赣东北苏区的中心地区，如上饶的茗洋、临湖、湖村，横峰的霞坊、龙门、葛原等地区。在“围剿”中强迫苏区群众为其开路，进占村寨后，烧杀抢掠，使这一地区生灵涂炭，无辜百姓惨遭杀戮。汤部所到之处，村舍尽成废墟，鸡犬之声难闻。汤还努力地推行所谓“防剿”、“清乡善后”等政策。由于汤恩伯“围剿”赣东北根据地十分卖力，不久就擢升为第二师师长。

赣东北根据地军民为了对付强大敌人的进攻，在方志敏的领导下，众志成城，用地雷、换丝炮、松树炮、大刀、梭标等简陋武器打击敌人。在战术上采取了方志敏制订的正确游击战争战术指导原则，这就是“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为了使红军更能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方志敏、邵式平还果断地将三万红军队伍缩编为 4000 人的三个主力团，采取一人一枪的正规编制，以便抓住战机，打击敌人；将缩编余下的人员分散到农村，作为乡赤卫队的骨干，扩大地方武装；各县组织独立连，各区组织五枪到十枪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开展游击战；并成立一新的独立营，到万年、余江等外线寻找机会打击敌人。由于根据地军民做好了反击敌人的准备，因而敌人进攻赣东北根据地时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汤恩伯部也损兵折将，半年“围剿”，死伤逾千，连旅部

驻地上饶也被红军攻克。12月22日，红军健儿一举攻克当时称之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歼敌一个团。

空前的胜利，辉煌的战果，加上不久后弋阳的七星尖战斗的胜利，敌人发动的“围剿”终于被彻底粉碎。赣东北苏区在巩固中又开始了新的发展。汤恩伯率领所谓劲旅，“围剿”赣东北根据地，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但最终失败告终，灰溜溜地离开了赣东北。

吴绍周口述

1932年，国民党军进兵鄂豫皖边区，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夏天，汤恩伯率八十九师由武汉出发，参加这一战役，7月到达黄安。八十九师各单位向师部请领给养，汤恩伯以后方运输困难为由，下令就地征购。由于战地居民大都逃散，无法购到。各部队在抢购勒索了一段时期以后，汤又下令征发，征发是拿粮不给钱的，地方既无应征机构，师部也无统筹组织，便由各旅、团、营、连，乃至独立的排、班自由行动，直接向民家掠夺。每天无论行军或作战期间，各单位纷纷派兵四处抢粮。起先运回来的尚属粮食马秣，渐至瓜果蔬菜，猪羊鸡鸭，以至耕牛牲口，油盐酱醋，均在征发之列。连各部队所需的官兵草鞋，也是从民家劫夺来的新旧衣服和布匹撕成一缕缕地编织起来的。当时有两个排长问我：“剿共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专来抢杀的吗？”但汤恩伯却视若无睹。整个鄂豫皖边区，经国民党军队大肆抢、杀、烧，真正满目荒凉，人烟绝迹。除了穿军服的人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的人。

汤恩伯虽然身统大军，但他并不是从军队基层单位干起来的。当师长以后，第一次在第二师被红四方面军战败而被撤职；第二次到八十九师，又参加对红四方面军作战，在鄂豫皖边区整

整一年的大小战役中，他自己一向是躲在师司令部里，很少上阵。1932年冬，他第一次带着师直属部队及二六五旅向黄安方面“扫荡”，事先经过反复调查，以为对军情已经摸清，但在三角地（距黄安东北约80华里）突被红军包围猛打，几至全军覆灭，嗣经援军解救，得以幸免。1933年，汤升任纵队司令，在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虽进犯到中央苏区，不过是乘着红军转移北上的机会，到过瑞金一次。

胡汉文口述

1934年8月间，当时我仍在汤恩伯第十纵队第四师补充团第五连任上士排副。

自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来，于1934年8月间，驻扎在江西广昌县一带的第三纵队樊崧甫部，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等，在强大炮兵和飞机配合下，向人民的红都——瑞金进犯。当时，汤恩伯所指挥的部队是：第四、第八十九、第八十八等3个步兵师，另配属2个炮兵团。从1934年8月5日，由广昌出发，会同第三纵队樊崧甫部，向驿前、石城、瑞金进犯，约在12月初进驻瑞金。

自从汤部进驻瑞金后，第十纵队改为第三纵队，他仍任指挥官兼第四师师长，下辖第四、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担任瑞金全县的主要“防务”。

汤恩伯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张贴布告，要求“凡是共产党员，以及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军队等干过事的人（包括游击队人员在内），不分男女老幼，限二十天以内分别在乡、区、县各个负责机关登记‘自首’，本指挥一律从宽，既往不咎，如上述人员有故意不登记‘自首’者，经查出或被亲友告发者一律处死刑。如上述人员的亲友有故意不报而包庇者也一律处死刑。”

第二项措施是在 1935 年 1 月底 2 月初，大概正在旧历年关时开始的。这时，正是当地的一些地主率领“返乡团”回到他们的家乡。同时，蒋介石的别动队也开到瑞金来。因此，汤恩伯就利用地主“返乡团”等地方武装，在别动队的监督下，使用其所部在该地进行了“清乡”。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例如，我在第四师补充团五连充任上士排副时，就奉命率领本排配合别动队，在地方武装“返乡团”的指引下，在瑞金外围的胡岭背附近两个村庄内逮捕了在红军中干过游击队的人员共 12 名，由连转送去汤恩伯指挥部。当时，汤恩伯在瑞金一带各个角落类似我这种行为不知有多少。由此可以肯定汤在瑞金“清乡”中逮捕和杀害的革命人员是不少的。事后我听说共逮捕了男女约有 2000 多人。其中不少被汤部在瑞金枪杀了，多数送到南昌“感化”。其次，还有 3000 多名女干部被捕后关在瑞金城內，听说有 100 多人被保释外，其余 100 多名比较年轻些的女干部被一些中级军官奸污后，强迫结了婚。

王良口述

我的叔父王寿庚因与汤恩伯是浙江兰溪体专同学，于 1933 年投靠了汤恩伯，在汤部第八十九师师部副官处任上尉庶务副官。该部参加了第五次反共“围剿”，在江西广丰、白水镇、凤凰山一带用碉堡政策，步步深入苏区。1934 年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北上抗日，苏区人民在国民党军的烧、杀、抢三光政策残害下，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军队的主副食也由此造成了困难。

那年夏季，叔父王寿庚有很多钱寄回来，但在信中讲到生活困苦，肉味无着，要求寄些荤菜去。我祖母徐氏爱子心切，乘顾崇年（浙江武义县城横街人）回家探亲返回部队之机，准备了几十斤腊肉、火腿和干菜卤蛋，叫我跟顾崇年一起送到江西去。那

时我才 16 岁，到那里已是深秋季节，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白水镇、凤凰山一带地方，只见到处是残垣断壁，碉堡林立，尸骨遍地，除了大兵，看不见村民。

我在大柏地第八十九师师部驻地找到了叔父王寿庚。当晚由我叔父请同乡吃饭。当时在第八十九师任职的有很多武义人，如徐镇球（师军法处处长）、陈寿余（军医处书记）、顾应昌（军法处司书）、翁文卿（师特别党部书记长）、汤述祖（师卫生队中尉军需）、张志（第五二九团营长）、徐肇成（事务长）、顾昌林（文书）、洪振华（文书）、王宝忠（勤务兵）、王尔茂（特别党部干事）等等。

在大柏地住了几天后，第八十九师经瑞金进入会昌县，师部驻城里。大柏地是 300 多户的大村，已看不到一只鸡、一条狗、一头猪。全村只有不到 100 个年老体弱的妇女和瘦弱的小孩。瑞金城同样是残垣断壁，到处可以看到炸弹坑。街头巷尾冷冷清清，不见人影，只见汤部第四师大兵正在拆民房，建碉堡。驻在会昌县的第八十九师同样在拆民房，建碉堡，路路设卡。对每天到会昌城里买卖东西的人都要盖三角联保章才准通行。

我到会昌后，因年纪小，文化低，无事可做，而回家又不可能。当时，武义人在第八十九师师部成立了一个剧团，我因在家学过锣鼓班，被叫去学做《小放牛》的牧童、《十五贯》的娄阿鼠、《辕门斩子》的杨宗保等角色。我的吃饭问题由汤述祖在卫生队挂个空名，拿十来元钞票。我除了学戏外天天东游西荡。几场演出后，由于当时生活枯燥，我和王应昌（师特别党部的司书）演的《小放牛》到处受人欢迎。

1935 年春节前，第八十九师五三〇团在行军途中遇到红军游击队伏击，死伤很多。会昌近郊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武义人张志营长也受了重伤。王仲廉师长下令“大烧、大杀、大逮捕”。

被抓到会昌城里关在刘姓祠堂和隔壁两座大屋里的有 3000 男女老小，由徐镇球（师军法处处长）亲自作简单的审问，胡侠书记官记录，只要是农会小组长干部、妇女干部、儿童团干部、赤卫队员，徐镇球都在名字上圈了个红圈。我在他背后看了，好奇地问了一声：“红圈划了做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小鬼不要多嘴！”

只见半天多时间问了约 200 多人，叫顾应昌（司书）将有红圈的一百几十人名单抄出来，我因好奇心所促，第二次又去问顾应昌（我小学老师），才知道有红圈的都是被杀的对象。当天下午，师特务连就将这批人用机枪打死在会昌城里大广场两棵五人合抱的大树后边的大塘沿。接着天天大杀，6 天时间，刘姓祠堂和两座大屋里被关的 3000 多人仅留下了二三百人。在被杀人员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最小的一个是留着瓦片发式的仅 13 岁的儿童团长。以上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的汤恩伯部下在会昌苏区大屠杀的情况。

1935 年春，汤恩伯任十三军军长时，军部驻瑞金城内。国民党为了纪念战死的官兵，在瑞金郊区建立起一个规模很大的犁庭公园和一座纪念塔。建成后，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庆功大会，我所在的小剧团也到瑞金参加演出。这次是汤恩伯的同乡骨干大聚会，其中有军部军法处处长王申瀚，掌握密码的机要秘书周祖廉、副官吴金生、军副官处主任刘国熙、副旅长刘国军、摄影师童尔能、军部秘书王醉耕等。

在瑞金住了 7 天，演了 6 场戏。当时我这个没有公职、不受约束的小青年不管人家官职大小，天天到同乡处玩，故又看到王申瀚比徐镇球屠杀还要狠得多。他自问自记，姓名头上被点上一·点·红·的都杀。我第二天又看到军部警卫营集体枪杀 600 多人，地点在犁庭公园附近的山沟里，其中有戴长舌帽的小红军、穿灰制服的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男女都有。天天听到杀人枪声，有的

将人头割下来送到南昌行营去。我问顾昌林(戏先生):为什么杀得这样凶?”他说:“春节前和会昌一样,瑞金也遭到红军袭击,国民党第四师丢了一个团。汤恩伯亲自督战,警卫营丢了两个连,师长王万林受伤,汤恩伯逃到厕所里躲了下来,败得一团糟,这是杀人报复!”我还看到一个红军指挥员在战场上牺牲了,尸体被抬到城里,头被割下来送到南京去。

过了不久,第十三军由瑞金、会昌沿赣江乘船到南昌。只见沿江两岸村庄都被国民党军队烧光,特别是吉安、樟树一带更惨。几十里不见民房,只见少数茅铺,田地荒芜不见人。我到南昌后,即归武义老家。以上情况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方耀口述

1935年4月8日,汤恩伯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同年下半年,汤纵队奉调鄂、湘地区,参加“围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在此期间,汤部改编为第十三军,辖第四师和第八十九师。汤恩伯任军长兼第四师师长。第十三军从此成了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当时的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军参谋长吴绍周以及旅长陈大庆、马励武,团长石觉、赖汝雄等,日后均成为汤集团的骨干。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汤恩伯军于3月份由风陵渡等地入晋,增援阎锡山的晋军。红军回师陕北后,第十三军渡过黄河进入陕境,后又移驻绥远省集宁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归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指挥。

四、汤恩伯的处世哲学

葛天口述

汤恩伯为什么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呢？在当时有各种传说。有的说在 1928 年冬一个下雪的星期日，他带军校学生跑步，路上遇到蒋介石，蒋当时很高兴。有的说他在 1930 年蒋介石同冯玉祥作战时任教导第二师的旅长，经常自己背着冲锋枪，到前线同士兵一起同甘共苦。这个情况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很满意。还有人说，他在抗日战争中打台儿庄很勇敢（实际上汤恩伯是最怕死的，他在前方遇到敌机时，吓得一个人在田野里乱跑。平时每逢部队转移，他总叫我在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若干里处为他另找房屋居住，原因是害怕敌机空袭总部）。

其实以上这些说法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是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心目中只有蒋介石一个人。汤恩伯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只知跟委员长，我只知听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他的人一概不理。”抗战时期，他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河南。他既不愿意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又不愿意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他再三要求将自己的部队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即归蒋介石亲自指挥。对此，当时任该集团军参谋长的万建藩对他说：“这样下去，对自己是不利的。”他说：“这种做法，委员长一定同意。胡宗南同朱绍良冲突，并不影响胡宗南的地位。”以后有人说，汤恩伯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因为蒋介石喜欢下面闹矛盾，不喜欢下面团结一致。

诸葛容口述

国民党统治是蒋介石独裁加上各派系互相倾轧的混合体，汤

恩伯看清了这一政治本质，回旋其间，得心应手。总结他的处世要诀，有这样几条：

一、对蒋介石绝对忠心。汤深知只要取得蒋的信任，一切困难自会迎刃而解，不愁没有前程。他与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有矛盾，曾多次公开对陈诚表示不满，由于蒋介石居间调处，陈与汤仍保持表面和好。汤对蒋个人是奴才与主子绝对服从的关系。他经常向蒋汇报各方面情况或建议，差不多每天都有致“委员长蒋”的电稿拍发。记的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举行宴会，酒酣耳热之余，忽然提起蒋介石的继承人问题，一时议论纷纷，有的猜是陈诚，有的说是何应钦。汤独坐一旁，默不作声，席间有人请汤谈谈他的看法，汤说：“委员长政躬康泰，这问题无讨论之必要，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事。”

二、不脱离枪杆子。蒋介石瓦解异己势力时，常用的方法是调升对方担任有名无实的高级官职，实质上是解除对方的兵权。汤懂得这个奥妙，他始终牢牢地抓住军权，不肯轻易放手。CC系的陈果夫曾几次拉拢他，要他出任行政职务，他均加婉拒。1946年南京报刊登过一则汤恩伯将兼任江苏省主席的消息，我将报纸送给汤恩伯看，试探他有何表示，他说：“军人不带兵就如鱼失水。”他要我查明这项造谣消息的来源，原来是CC系许孝炎所办的一家通讯社发出的。

三、对国民党、团、派系，采取敷衍手法。汤对CC系、三青团及其他派系，一向采取敷衍态度，在他的部队及所属各机构中，没有什么党、团的活动，很多干部也不是党、团员。

1942年10月，汤到河南鲁山县境的伏牛山视察，伏牛山在鲁山县以西，绵亘百余里，当时河南省政府设在鲁山。汤视察伏牛山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山区作为后勤基地，原来他的补充兵团的新兵都驻扎在这山里进行训练；此外，汤在山里还办有印刷厂

及造纸厂。伏牛山有铁矿及柞蚕丝等资源，又有上汤、牛汤、下汤三处温泉。汤一到伏牛山，河南省政府的衮衮诸公，迎送不迭，尤其是三青团河南省书记王汝泮特别巴结，专程赶到三十里外的下汤来迎接，还献了一册他亲撰的所谓《紧急救国意见书》，十行纸上写着蝇头小楷，装成一厚册。汤将这册子交给我看一遍，当时我的任务是与河南民政厅长方策（定中）联系，拟订一个开发伏牛山的初步计划。后来我将计划草案向汤汇报，并顺带提到王汝泮的《紧急救国意见书》，汤问起《紧急救国意见书》说些什么？我说：“内容空洞，不切实际。”汤听了停顿了很久，才说：“写封回信给他敷衍一下。”

1948年汤到浙江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在杭州的CC系方青儒利用金、衢、严、处四府同乡会名义，举行欢迎汤恩伯的茶话会。汤带领即将出任行政督察专员的四府同乡洪显成（浦江人，汤部下师长）、吕师扬（吕公望之子）等参加。方青儒致欢迎词，将汤大事吹捧一番。接着是“国大”代表吴孝姑等人慷慨陈辞，大致都是先发表一通反共谬论，然后要求汤即速“剿共”。最后汤致谢词，出人意外的是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些维持地方秩序，搞好治安工作是他应尽之职责的话，至于谈到共产党，他说这是一个有关国际性的政治问题，不是单凭一二人之力所能解决的，即使是三头六臂的特殊人物也难奏肤功。这番话说得方青儒、吴孝姑等面面相觑，万分丧气。

五、“北胡南汤”

张文心口述

汤恩伯自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八九年工夫，便由一个旅长提拔为集团军总司令，坐镇一方，不久又独揽鲁苏皖豫边区的军政